

作为考古学家的图齐^①

[意]皮埃尔法兰西斯科·卡列宁 著 程嘉芬译 吕红亮校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四川大学考古系 成都 610064)

中文摘要: 朱塞佩·图齐是意大利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大师，同时，也是一位对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家。他强调实地考察对东方研究的意义，并对造型艺术表达出强烈兴趣，这种研究取向在其《西藏画卷》《印度-西藏》等著作中有所体现。他还推动了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亚非研究院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的考古工作，如著名的斯瓦特研究。此外，图齐还开拓了东方研究所在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朗等地的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并对亚非研究院的组织构建以及研究理论等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他推动了意大利亚洲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亚非研究院的重要奠基者。

关键词: 朱塞佩·图齐 西藏 斯瓦特研究 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亚非研究院

考古学是图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在其生命的几个重要时段里投入了最多时间和精力工作之一。然而，在一些人看来，本文的标题即使不是完全错误，也是不太恰当的。作为一名东方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者，图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田野研究与考古学领域那些“资深专家学者们”之间的分野。这种分野可追溯至他的大学学习阶段。当时图齐的兴趣是古典古物学，这从其第一部著作中便可体现，它以研究保存在他的家乡马切拉塔(Macerata)的未刊铭文(图齐, 1911)为主题。从中不难发现，当时那些颇为枯燥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将图齐引入了另一个领域。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图齐的“夫子自道”吧！这段引文源自他为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的第一章^②：

在许多人眼中，通过在亚洲发起合作发掘项目，我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可是，那些熟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兴趣在于思想史和宗教史。从一开始我就说过，我非常尊敬那些考古学家们，不仅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还因为他们的职业要求一种书斋与漂泊生活的完美结合：既要研读浩若烟海的文献，也要在穷乡

① 本文译自 Pierfrancesco Callieri, Giuseppe Tuui as Archaeologist, *IsIAO: East and West*. Vol.56, Nos.1-3 (September 2006), pp.11-22.

② 本文中所有署名为图齐 1963a 和东方研究所活动通讯 (*IsMEO Attività*) 的引文，均由麦吉尔夫雷 (I.McGilvray) 从意大利原文译为英文。IsMEO 全称是意大利东方研究所 (也称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最早以学术文化机构成立于 1933 年，目的在于拓展意大利与中东、远东国家间的关系，并研究经济问题；所长是金蒂勒 (Giovanni Gentile)，副所长是图齐 (Giuseppe Tucci, 1894-1984)。该研究所于 1995 年与意大利非洲研究所 (IIA) 合并为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IsIAO)。

僻壤间从事田野发掘……虽然我的第一项研究是关于拉丁铭文的,但事实上我并非一名考古学家。只是事有凑巧,大概刚过十二岁,我开始着手学习梵文和希伯来语,后来又开始了对中亚伊朗的研究。逐渐的,我陷入东方研究的迷宫之中,并为之着迷,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当我渐渐熟知有关亚洲的书籍和智慧的时候,我脑海中隐约闪烁着关于如何揭开那些困扰与疑惑的新灵感。……并且,我发现比起考古学中枯燥而乏味的语言文献学,这更具生命力。至少,在我进入大学学习时,考古学似乎陷于语言文献学的囹圄、迷失在繁琐考证的细节中。然而我曾对考古学的期许是:这门学科能够提供一套具有想象力的方法,使得古代的人和事物“复活”,即便仅是惊鸿一瞥。因此,我放弃了考古学,满怀希望地(目前看来并非徒劳)转向了东方学。(同上 1963a)

在年轻的图齐眼中,枯燥琐碎的考古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古典考古学(从图齐少年时到他 1919 年从罗马大学毕业期间),在以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文化氛围里,除了少数几个领军人物之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仍居主导地位。仅有很少的几位考古学家注意到史前考古带来的启示(Barbanera 1998)。在此,我们不免想到比图齐小几岁的比安基·班迪内里(Ranuccio Bianchi Bandinelli)写过的一段个人评论,提到他从那些“非常无能的老师们”那里只学会一件事,即“为避免成为道德和心智的败坏者,如何不要去发表演讲,如何不要去信奉科学”(见前引著作:108)。

当然,就此而言,图齐后来通过自己对亚洲的哲学与宗教学研究,向考古学家们展示了他所得到的论据充分的研究方法:不仅需要书斋式的研究,还需要直接接触东方的文化与人民,这正是其早年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所做探险的出发点。

在这些考察中,图齐表现出对造型艺术的强烈兴趣,而他的关注范围甚至包括那些并不精美的遗物,这一研究取向已经包含了某些现代研究方法的色彩,即对人类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做全面研究。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大师级巨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这是所有研究西藏艺术和图像志必备的参考书)一书中对精美的佛教艺术品的研究,亦可见于其另一部对西藏文化贡献钜深的著作《印度—西藏》(*Indo-Tibetica*)中对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擦擦”的关注。

恰恰是这种在考察中不断寻找新资料的动力,将图齐引向考古学,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

近些年,完成了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考察之后,为了研究的目的,现在的我又回归考古学,但这并非由我个人所完成,而是与那些具备高超技术的专业考古同僚们一道,共同发现了多种古迹、文献以及能够填补亚洲大部分地区历史空白的文物。(同上 1963a:12)

西藏的政治变化无疑在这一选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早在 1950 年,图齐便已经转向尼泊尔进行他的考察。这项考察工作一直持续到 1954 年,考察成果形成了一部非常丰富的铭刻学和建筑学的文献。

但是,图齐清楚自己进行的地面考察收集到的信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逊

于考古发掘的巨大潜力。因此，1955年图齐向意大利政府寻求特别资助，希望在历史上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①进行考古学研究。在1956年东方所（IsMEO）的活动通讯上，我们可以读到“图齐教授和本所总干事在该地区勘察，并与尼泊尔政府代表就考古发掘区域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报道（IsMEO Attività 1955-56: 11）。而真正将这项工作付诸实践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由西雅·安东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代表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亚非研究院（ISMEO/IsIAO）主持发掘，其后由乔瓦尼·维拉尔迪（Giovanni Verardi）接手主持工作。

虽然这一项目最终仅成为图齐人生中的一个梦想，但同年，他又成功发起了另一个项目并持续进行至今，即意大利东方研究所斯瓦特（Swat Valley）^②考古团（下文简称IAM）——多年来，该项目一直是东方所在佛教考古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考古工作。

正是西藏，让图齐做出了这个非常恰当的选择。“从西藏的田野研究中催生出来的斯瓦特（Swat）研究，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生命中最热爱的，很难有其他新的研究可以让我感到如此愉悦”（Tucci 1963a:12）。莲花生大师是藏传佛教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位来自乌仗那（Orgyan）发源地的大师于公元8世纪将佛教由斯瓦特传入西藏。斯瓦特地区便开始成为佛教传统的真正圣地，虽然该地区距释迦牟尼实际活动过的地域还很遥远，但佛教世界的诸多大事均发生在此。众多朝圣者相继拜谒这里，其中包括了法显、宋云、玄奘、惠超这些公元5世纪至8世纪的大师们，他们是途经此地西去取经的。他们那些关于旅途的具体描述作为历史文献流传至今，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史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一地区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此外，斯瓦特地区也曾被亚历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一支远征军征服过，图齐扎实的古典学术背景使他没有忽略罗马史家鲁夫斯（Curtius Rufus）和阿里安（Arrianus）的记载。



图1 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和拉乌尔·库列尔（Raoul Curiel）（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主任）在巴基斯坦（1956?）（所有图片均来自（IsIAO）

① 蓝毗尼（Lumbini），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在今尼泊尔境内。它处于尼泊尔西南河印度交界处，在鲁潘德希县境内，距加德满都280公里。

② 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1955年,图齐与巴基斯坦政府及斯瓦特地方政府的开明领导者达成协议,在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进行第一次考察(见Olivieri的论文)。与1926年匈牙利-英国籍探险家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在此河谷的首次考察不同,图齐的这次考察是以中文古代文献为指导,沿着主要干道以及两侧山谷进行多次调查。时至今日,在斯瓦特地区仍流传着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生动回忆,伴随着他坚定不移的步伐,和当地敏捷的向导并行,在古代文献的指引下,他似乎总能预知和发现,而那些发现就如同在他眼前一般。

无论从哪方面看,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地面勘察在现代考古学中的重要性,1956年的这次考察都应被看作是一项考古工作。尽管在对待材料或证据时,一直奉行下述原则,即尽可能收集所有信息、不以先验主观方式阐释数据;但确实,在本次考察中并没有采集任何陶器。

在考察工作期间,图齐发现这一区域与他兴趣所在的两个主要方面都相符合,并指出这两个方面对斯瓦特河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证据与偶然发现的佛教遗存有关,并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存在关系;换言之,体现在考古材料上,便是佛教建筑与艺术、城镇规划与居民建筑。为了发掘工作,图齐请来了两位古典考古学家合作:一位是多媒尼科·范契拿(Domenico Faccenna),图齐委托他主持位于明戈拉(Mingora)^①附近的布特卡拉I区(Butkara I)佛教遗址的发掘工作;另一位是乔治·古里尼(Giorgio Gullini),他直至1962年都在负责主持乌德克拉木城(Udegram)的发掘工作,该城址已被确认是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攻克过的奥拉城(the city of Ora)。1962年,古里尼开始与东方所斯瓦特考古团合作。布特卡拉遗址的发掘持续到1962年,此发掘对犍陀罗艺术的时间序列和艺术风格的框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Faccenna 1962, 1980-1981),它还拉开了本地区其他丰富活动的序幕(Callieri 1989; Gancenna et al. 1993; Faccenna 1995b, 2001; Noci et al. 1997),而当时



图2 图齐于1958年参观斯瓦特乌特洛特(Utrot)地区一个村庄中的木结构清真寺

有关乌德克拉木城的材料大部分尚未发表(Gullini 1962)。东方研究所的研究活动至今仍未中断,其中一项关于史前时期的延展研究由乔治·斯特科尔(Giorgio Stacul)主持(Silvia Antonini & Stacul 1972; Stacul 1978b),对于时代更近者,如伊斯兰时期的研究则要感谢翁贝托·谢拉托(Umberto Scerrato)的主动性研究(Scerrato 1984, 1986a)。

在巴基斯坦的研究领域扩展之后,同年,图齐被授权在阿富汗进行工作。阿富汗的考古研究长期被法国考古团(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即 DAFA)垄断。图齐选择了加兹尼城(Ghazni)^②——11世纪伽色尼王朝(Ghaznavid dynasty)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伊斯兰教从这里被介绍到北印度。正如我们从东方所的活动通讯中所看到的,图齐选择这里的原因源自这样的兴趣:“东方研究所之所以选择这些区域是因为对伊斯兰文明的极大兴趣,

① 明戈拉(Mingora): 斯瓦特山谷最大的城市,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② 加兹尼(Ghazni): 阿富汗东部城市,加兹尼省首府。位于干旱高原上,傍加兹尼河。

也是因为至今为止，其他国家所做的几乎都是前伊斯兰时期的地域性专门研究”，上述观点是他参考法国考古团在拉什卡瑞巴扎（Lashkari Bazar）所做过的唯一一项重要的工作而得出的（IsMEO Attivita 1955-56:13）结论。作为一名研究佛教的学者，图齐竟然鼓励在阿富汗进行标志着佛教衰落的这一时期的研究，流露出极为现代的史学观，这一点令人惊异！对于在加兹尼的活动，伊斯兰学者邦巴西（Alessio Bombaci）被召唤而至；同年稍晚时候，又开始了对伽色尼时代艺术品的收集（Bombaci 1957； Giunta 2005）。这些均被完整记录在了描述图齐研究方法的本地文档中。在加兹尼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57年，当时邦巴西得到考古学家谢拉托的支持（Bombaci 1959； Scerrato 1959）。在法国考古团当时的领导者看来，将本地区的发掘机会与他人分享是一种可笑的施舍（Scerrato 1995），但恰是这种所谓施舍导致了一项最伟大的发现——马斯欧德三世（Mas'ud III）宫殿的发现。它作为东部伊斯兰主要王朝之一的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宫殿方面的综合信息，远丰富于法国人在拉什卡瑞巴扎所做的行省级别宫殿遗址的发掘。这项复杂的发掘工作是伴随1959年由阿达梅斯亚努（Dinu Adamesteanu）在塔帕萨达尔（Tapa Sardar）^①的佛教圣地所进行的第一次发掘活动而开始的，稍后的规范性发掘则是在1966年至1976年间在塔代伊（Maurizio Taddei）指导下进行的（Taddei 1968）。1961年，由古生物学家萨瓦尔多·普利西（Salvatore Puglisi）主持，开始在阿富汗北部的哈扎萨姆（Hazar Sum）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几年的发掘第一次将该地区的人类历史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即使是其之后的占领也如伊斯兰时期那般漫长，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在岩石上凿出房间、泥砖建筑物和巨石结构（Puglisi 1963）。

1959年东方研究所（IsMEO）与锡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塞斯蒂耶里（P. C. Sestieri）实现了对斯里兰卡（Sri Lanka）境内阿努拉达普拉地区（Anuradhapura）佛教遗址的独立发掘。

同年，图齐对古代中亚伊兰语的兴趣引导他开始对被多数人认为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htra）讲法传教摇篮的今锡斯坦（Seistan）地区^②进行探究。他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区域的潜在研究价值，而在此之前，塔特（G.P. Tate）、赫兹菲尔德（E. Herzfeld）和斯坦因爵士都曾于此地做过调查。也从1960年开始，经锡兰政府同意，东方所开展了一些发掘工作。图齐选择的第一个遗址是帕提亚萨珊遗址（Parthian Sasanid），该地点与赫瓦贾山（Kuh-e Khwaja）是一个整体，古里尼曾在此做过试探性调查（Gullini 1964）。继古里尼和东方所各自独立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之后，翁贝托·谢拉托作为继图齐之后意大利非洲研究院（IsIAO）的领导者，在伊朗学者奥利尼（Gherardo Gnoli）的帮助下对这一地区开展研究。谢拉托扩大了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希腊化时期的考阿耶山姆（Qal'a-ye Sam）到伊斯兰时期的比比道斯特（Bibi Dost）等众多遗址，而其中最重要当属在达罕古莱曼（Dahan-c Gholaman）地区的阿契美尼德城（Achaemenid）的发掘，大量建筑和宗教文化方面的资料被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唯一与此复杂时期有关的古伊朗时代的宗教资料。

图齐一直跟进着东方所的研究任务。1967年，他在伊朗将大型青铜时代遗址沙赫尔苏

① 塔帕·萨达尔（Tapa Sardar）：位于阿富汗南方扎布尔省。

② 锡斯坦（Seistan）：位于伊朗东南部，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属于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其东面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

赫特 (Shahr-e Sokhte)^①的发掘工作委托给古民族学家毛里西奥·托西 (Maurizio Tosi) 主持, 该遗址最终获得的材料为我们了解史前时代伊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而在此过程中, 图齐也最终完成了其历史性研究方法的理论 (Tosi 1968, 1983; Savatori & Vidale 1997)。

今天, 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活动范围已经从非洲扩展至中国, 对其考古工作的回顾则已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 不过该研究院在进行各项活动时, 方法论上的连续性却可追溯到它最初成立时的结构。事实上, 如果我们注意到 1959 年成立的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亚洲和都灵发掘考古研究中心 (Centro Scavi e Ricerche Archeologiche in Asia dell'IsMEO e di Torino) 的一些相关活动规定, 或许就可以看到这种方法论形成的端倪。该机构于 1962 年变更为东方研究所亚洲考古研究中心 (IsMEO Centro studi e scavi Archeologici in Asia, 也称发掘中心 Centro Scavi), 其作用是协调东方所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各项考古任务, 图齐将该机构委托给范契拿进行管理。

在东方研究所的官方公文中, 表述了关于该机构的几项原则:

中心的总部在罗马, 它已经通过意大利在亚洲各地开展的考古活动运作多年。在巴基斯坦 (斯瓦特) 的工作开始于 1955 年, 在阿富汗 (Ghazni; Mazar-i-Sherif) 的工作分别开始于 1956 年和 1961 年, 在伊朗 (锡斯坦) 的工作则开始于 1959 年, 收获的成果现在已被广泛熟知, 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通过这样的方式, 意大利与其他在亚洲的这些地区长时间进行广泛研究活动的国家, 诸如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研究同时在三个不同区域内展开, 年代从史前—原始时期至伊斯兰时期, 经历了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帕提亚 (Parthian)、贵霜 (Kunshan)、萨珊 (Sasanid) 等时代, 从横向和纵向的意义而言, 该研究通过共同的空间与时间坐标将其连接起来。它们趋于一致并通过相互关联且符合逻辑的方式解决了一个民族在其统一的文化观念中的诸如历史学、哲学、金石学、宗教学、艺术学的本质问题。[……]发掘工作严格按照层位学准则, 并使用最合理的技术与设备 (如航拍等); 其任务不仅仅包括纯粹的研究, 还包括关于对各种遗物 (如雕塑、粉饰灰泥、青铜和铁制遗物等等) 在复杂的修复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求具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因此, 实验室研究以及就地实验主要集中在特别难以修复的材料上, 比如通常用于建筑的泥砖。中心具有全面协调各考古团体工作程序的职责, 完成图片材料的分类、排序及对实物 (陶瓷器、石膏等) 的拍照等各项工作。为了整理并出版公布各种研究成果及发掘报告, 大量宝贵的文物存放于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 (the 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Art), [……]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手段对所有种类的遗物进行分析和研究, 邀请不同的科研机构互相合作: 对陶瓷器而言, 需要法恩扎国家陶瓷研究院 (the National Ceramic Institute of Faenza) 的帮助; 而对人骨材料而言, 则须获得罗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of the University of Rome) 的支持[等], 最后, 需要将电子手段视为在具体研究中的重要支持, 例如对伊斯兰陶瓷器的不同类型、装饰风格、制作技术等繁琐的分类工作。总之, 上述各项是

① 沙赫尔苏赫特 (Shahr-e Sokhte) 意为烧毁的城市。

对发掘成果及各项工作展示和说明的准备工作。(IsMEO Attivita 1962:5-7)

虽然,很多未署名的文件被归功于发掘中心的管理者范契拿,但显然图齐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他每年都要到各个遗址进行访问,并跟进工作直到结束。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也不应被忽视,图齐认为其重要性应等同于依赖于它们的考古学研究。朱塞佩·图齐总是能与他工作中遇见的东方人成功地建立深厚的关系,并很快说服对方相信东方所与亚洲各国政府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根据近期在各地达成的一项共识,各国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应与那些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以这样的方式,在斯瓦特地区,对乌德克拉木城堡的保护工作便成为了一个范例(Gullini 1958),而在1963年也有人鼓动在斯瓦特建立一座博物馆,用于保护那些意大利人所发掘出土的文物,就像1958年在罗马建立的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一样。国立东方博物馆由范契拿负责管理,主要任务在于保护亚洲国家捐赠给东方研究所的文物资料,以及通过意大利的各个博物馆所收集得到的所有散落的东方艺术文献。

1962年建立的修复中心(Centro Restauri)旨在协助发掘中心的工作,由朱塞佩·詹德(Giuseppe Zander)负责协调。在阿富汗,建筑结构问题促进了新保护技术的发展,并在马斯欧德三世宫殿建筑的保护中予以测试和使用。此外,对在加兹尼省发现的伽色尼王朝穆罕穆德时期(Mahmud)的墓葬以及位于阿卜杜拉扎克的帖木儿王陵^①(the Timurid Mausoleum of Abdur-Razaq)也进行了修复工作。同样的,1964年至1966年,修复中心还修复了首都喀布尔的巴布尔清真寺(the Babur Mosque)。

由于与伊朗政府达成一致协议,伊朗成为修复中心可以从事基层活动的国家(Zander 1968)。1964年,修复中心开始对伊斯法罕市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该项工作在1979年之前一直由欧金尼奥·加尔迪耶里(Eugenio Galdieri)领导负责。他凭借在萨菲(Safavid)工作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早年的建筑学知识,帮助伊朗培养了整整一代专门进行文物保护的建筑师(Galdieri 1972-1984)。在星期五大清真寺(the great Friday Mosque)的修复工作显示此地应该进行一次考古调查,因而促成了由谢拉托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最近由于与伊朗文化遗产和旅游组织(Iran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Organization)合作,这项工作得到重新启动。(Scerrato 2001)。同样,对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发掘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阿契美尼德城(Achaemenid town)也开展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该项目与在伊斯法罕开展的时间一样,都始于1964年,持续至1979年。这不仅为我们了解遗址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培养了具有石材建筑修复技能的一批工作者,直到今天他们进行工作所遵循的原理依然基于当时所学。波斯波利斯遗址的负责人是朱塞佩·提莉亚(Giuseppe Tilia),其助手安妮·提莉亚(Ann Britt Tilia)的工作则主要是为与保护工作有关的考古调查做初步准备。(Britt Tilia 1972, 1978; Tilia 1995)

就发掘项目而言,图齐并不直接负责文物保护的工作而是与专家们合作。这些专家都是他亲自从意大利最优秀的人才中挑选出来的,极具奉献精神,每一步工作都十分仔细谨慎。

^① 帖木儿王陵(the Timurid Mausoleum of Abdur-Razaq)于1966年建立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图3 朱塞佩·图齐于1964年第一次在波斯波利斯遗址(伊朗);他旁边从左起依次是波斯波利斯遗址伊朗方面负责人、朱塞佩·赛德教授(东方研究所修复中心稍后的负责人)、多媒尼科·范契拿(东方研究所发掘中心负责人)。

这种迅猛、近乎狂热的作为,表明了图齐对直接参与东方研究所田野考古工作的强烈兴趣。我们必须赞誉图齐为亚洲考古学在意大利的诞生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唯有他杰出的组织能力才使得诸多工作从无到有,并被推至国际公认的卓越水平。因此,图齐是今天的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伟大奠基者。

虽然图齐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是专家,但对于他在扩展我们对古代亚洲的认识所做的考古学研究方面的远见卓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肯定与推崇。他充沛的活力、从不循规蹈矩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考古发掘者所不可缺少的范例,当然,对于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一样的:只需考虑到他对斯瓦特地区所做作的贡献就已经足够(参见Filigenzi & Callieri 1997年所做的评述)。在那里所发现的史前文物和遗址激发了他广泛的思考。他不但是那些理论学者的榜样,也是考古学者当前的偶像。当前的一些考古学家们一门心思执着于考古技术和那些被图齐所不屑的繁琐小事,他们经常忽视那些由物质文化所支撑的可以用于解决问题的基础工作。在东方所的田野工作中,图齐的工作方法是非常新式的,即旨在不忽略任何一条证据的前提下用历时性的视角重建某一地区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考古研究领域中为了更快达到基础阶段层次而牺牲整体性,鉴于此类情形,图齐的方法更应效仿,虽然图齐大部分的兴趣是在佛教与古代伊朗,但他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拒绝那些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所获得的与史前或伊斯兰时期有关的研究资源。

时至今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那些由专业考古学家们所领导的、以重视方法论为主要特征的工作依然堪称典范,但事实上每一项工作都与图齐的先导性贡献存在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量的与不同科研机构合作而开展的考古研究是相当惊人的,如进行至今的基于研究陶器制作程序的计算机应用可以作为代表该类型研究的第一个例子。

东方所考古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的持续关心，体现了对文化的远见卓识和对东道主国家的深刻尊重，而 50 年前，这些东道主国家还认为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是可有可无的，如今它们都已认识到必要性。同样，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对研究结果合理传播的敏锐性适应。图齐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别关注程度，似乎走在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前端。

尽管图齐从来不自诩为考古学家，但从其在田野考古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热诚，考古学家的头衔对他而言当之无愧。任何考古学家，只要读过图齐 1955 年出版的斯瓦特调查报告（Swat reconnaissance），都会同意这种“追认”是再恰当不过的。

最后，图齐关于考古学研究的构想还涉及政治层面，对此，他自己有比我更好的表述：在西方国家似乎更乐于设置壁垒与障碍的年代里，这个层面的探讨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

如今的意大利，通过这些发掘活动，正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这些国家在亚洲地区的科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野心和超功利的声望。虽然简略，但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应被开明而有修养的人所知晓。我们会对面貌接近的文化感到吃惊，对它们抱有极大兴趣是因为尽管相距遥远，但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而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艺术最终传播的结果。如果这种古老的团结可以被用来培养一种真诚、坚持、协作的精神，我们不仅可以为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而且还可以帮助亚洲本地居民增强自我关注，也可以加强我们意大利人内部之间的相互支持。

参考文献

Barbanera, M. (巴布那瑞) (1998) : 《意大利考古学》(*L'archeologia degli Italiani*) . Roma.

Bombaci, A. (邦巴西) (1957): 《加兹尼城》(Ghazni) . *EW* (《东方与西方》) , 7, 3, pp. 247-59.

Bombaci, A. (邦巴西) (1959): 《加兹尼城的考古发掘》(Introduction to the Excavations at Ghazni) . *EW* (《东方与西方》) , 10, 1-2, pp. 3-22.

Britt Tilia, A. (提莉亚) (1972): 《波斯波利斯以及法尔斯地区其他遗址的修复和研究》(*Studies and Restorations at Persepolis and Other Sites of Fars*) . RepMem, X VI. Rome.

Britt Tilia, A. (提莉亚) (1978) : 《波斯波利斯以及法尔斯地区其他遗址的修复和研究 (二)》(*Studies and Restorations at Persepolis and Other Sites of Fars. Part II*) . RepMem, X VIII. Rome.

Callieri, P. (卡列宁) (1989): 《赛杜沙里夫 I (巴基斯坦斯瓦特): 佛教圣地及修道院》(*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1.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Monastery*) . RepMem,

X X III, 1. Rome.

Faccenna, D. (范契拿) (1962): 《布特卡拉 I 区遗址》(*Mingora: Site of Butkara I*) . RepMem, I . Rome.

Faccenna, D. (范契拿) (1980-81): 《布特卡拉 I 区 (巴基斯坦斯瓦特) 1956-1962》(*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1956-1962*) . RepMem, III, 1-5.2. Rome.

Faccenna, D. (范契拿) (1995b): 《赛杜沙里夫 I 区 (巴基斯坦斯瓦特), 2, 佛教圣域, 佛塔区》(*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 RepMem, X X III, 2. Rome.

Faccenna, D. (范契拿) (2001): 《神圣赛杜沙里夫 I 区的佛塔与雕像》[*Il fregio figurato dello Stūpa Principale nell'area sacra buddhista di 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RepMem, X X VIII. Roma.

Faccenna, D., A. N. Khan & I. H. Nadiem (范契拿、纳丁) (1993): 《潘 I 区 (巴基斯坦斯瓦特)》(*Pānr I (Swāt, Pakistan)*) . RepMem, X X VI. Rome.

Filigenzi, A. & P. Callieri, eds. G. Tucci, (弗里吉兹、卡列宁编, 图齐著) (1997): 《斯瓦特: 历史与考古记录》(*On Swa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 Rome.

Galdieri, E. (贾尔迪耶里) (1972-1984): 《伊斯法罕: 古马清真寺》(*Isfahan: Masjid-i Gum'a. I -III*) . IsMEO, Restorations, I . 1-3. Rome.

Giunta, R.基塔 (2005): 《加兹尼城的丧葬铭文》(*Les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de Gazni. (IVe-IXe/Xe-XVe siècles)*).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Series Maior, 8. Napoli.

Gullini, G. (古里尼) (1958): 《乌德克拉木城堡的考古发掘笔记: 修复问题》(Marginal Note on the Excavations at the Castle of Udegram: Restoration Problems) . *EW* 《东方与西方》, 9, 4, pp. 392-48.

Gullini, G. (古里尼) (1962): 《乌德克拉木城》(*Udegram*) . RepMem, I . Rome.

Gullini, G. (古里尼) (1964): 《书评: 伊朗阿契美尼德城的萨珊建筑》(*Architettura iranica dagli Achemenidi ai Sasanidi. Il 'Palazzo' di Kuh-i Khwagia (Seistan)* , review by G. Tucci) . Torino in *EW* 《东方与西方》, 16, 1-2, 1966, pp, 143-47.

IsMEO attività 1955-56 = Attività svolta dall' Istituto nell' anno accademico 1955-56 《东方研究所活动通讯 (1955-56)》) . Roma 1956.

IsMEO attività 1962 = Attività svolta dall' Istituto nel 1962 《东方研究所活动通讯 (1962)》) . Roma 1963.

Noci, F., R. Macchiarelli & D. Faccenna (诺奇、范契拿) (1997): 《赛杜沙里夫 I 区 (巴

基斯坦斯瓦特), 3, 墓地》(*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3. The Graveyard*) . RepMem, X X III. 3. Rome.

Puglisi, S. (萨瓦尔多·普利西) (1963): 《哈扎萨姆遗址的初步研究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searches at Hazar Sum (Samangan)) . *EW* (《东方与西方》), 14, 1-2, pp. 3-12.

Salvatori, S. & M. Vidale (赛尔托瓦、维德勒) (1997): 《沙赫尔苏赫特 (1975-1978): 中心区域发掘的初步报告》(*Shahr-i Sokhta 1975-1978: Central Quarters Excavations. Preliminary Reports*) . RepMem, Series Minor, 1. Rome.

Scerrato, U. (谢拉托) (1959): 《加兹尼城第一次两处发掘活动》(The First Two Excavation Campaigns at Ghazni, 1957-1958) . *EW* (《东方与西方》), 10, 1-2, pp. 23-55.

Scerrato, U. (谢拉托) (1984): 《斯瓦特河谷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木构建筑: 1984年工作报告》(The Wooden Architecture of Swat and the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A Report on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1984) . *EW* (《东方与西方》), 34, 4, pp. 501-15.

Scerrato, U. (谢拉托) (1986a):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艺术史和考古研究: 加兹尼清真寺的考古发掘》(Research o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Islamic Art in Pakistan: Excavation of the Ghaznavid Mosque. 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 *EW* (《东方与西方》), 36, 4, pp. 496-511.

Scerrato, U. (谢拉托) (1995a): 图齐《伊斯兰考古》(Giuseppe Tucci, *l'archeologia islamica ed altri parerga*) . In B. Melasecchi, ed., *Giuseppe Tucci. Nel centenario della nascita (Roma, 7-8, giugno 1994)*. IsMEO, Conferenze, 8, pp. 85-111. Roma.

Scerrato, U. (谢拉托) (2001): 《意大利考古团在伊朗星期五大清真寺的考古研究》(Ricerche Archeologiche nella moschea del Venerdì di Isfahan della Missione Archeologica Italiana in Iran dell'IsMEO (1972-1978)) . In *Antica Persia. I tesori del Museo Nazionale di Tehran e la ricerca italiana in Iran*, pp. XXXVII-XLIII. Roma.

Silvi Antonini, C. & G. Stacu (安东尼尼、施塔尔) (1972): 《斯瓦特河谷史前墓地 (巴基斯坦)》(*The Proto-historic Graveyards of Swāt (Pakistan)*) . RepMem, VII, I - II . Rome.

Stacul, G. (施塔尔) (1987): 《史前及原史时期的斯瓦特河谷, c. 3000-1400 B.C.》(*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wat, Pakistan (c. 3000-1400 B.C.)*) . RepMem, X X . Rome.

Stein, A. (斯坦因) (1929): 《通往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 London-New York.

Stein, A. (斯坦因) (1930): 《上斯瓦特地区及其邻近山区的考古之旅》(*An Archaeological Tour in Upper Swat and Adjacent Hill Tracts.*) MASI, 42. Calcutta.

Taddei, M. (塔代伊) (1968): 《塔帕萨达尔初步报告》(Tapa Sardar. First Preliminary Report) . *EW* (《东方与西方》), 18, 1-2, pp. 109-24.

Tilia, G. (提莉亚) (1995): 《波斯波利斯遗址修复工作中色彩运用的注意事项》(Appunti sull'uso del colore nella Sala del Consiglio di Persepolis) . In M. Bernardini, ed., *L'arco di fango che rubò la luce alle stelle. Studi in onore di Eugenio Galdicri per il suo settantesimo compleanno*, pp. 321-22. Lugano.

Tosi, M. (毛里西奥·托西) (1968): 《沙赫尔苏赫特的考古发掘: 伊朗锡斯坦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报告》(Excavations at Shahr-i Sokhta, a Chalcolithic Settlement in the Iranian Sista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Campaign, October-December 1967) . *EW* (《东方与西方》), 18, 1-2, pp. 8-66.

Tosi, M., ed. (毛里西奥·托西编) (1983): 《史前锡斯坦, 1》(*Prehistoric Sistan, 1*) . RepMem, X I X.1. Rome.

Tucci, G. (图齐) (1911): 《马切拉塔未刊铭文报告》(Incriptiones in agro Maceratensi nuper repertae neque iam vulgatae) . *Mitteilungen des königlichen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Römische Abteilung*, X X VI, pp. 284-87.

Tucci, G. (图齐) (1932): 《印度·西藏, 第一卷, 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佛塔与擦擦》(*Indo-Tibetica, I . mC'od-rten e ts'a-ts'a nel Tibet indiano ed occidentale*) . Roma.

Tucci, G. (图齐) (1958a): 《斯瓦特河谷考古调查的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Swāt) . *EW* (《东方与西方》), 9, 4, pp. 279-348. (Repr. Filigenzi, A. & P. Callieri, eds. (1997)

Tucci, G. (图齐) (1963a): 《穿越斯瓦特河谷》(*La via dello Swat*) . Bari. (2nd ed., Roma 1978).

Zander, G. (山德尔) (1968): 《伊朗的古迹修复工作》(*Travaux de restauration de monuments historiques en Iran*) . RepMem, VI. Rome.